

心之  
所向

上篇  
戴德森醫師的一生

第二章

# 從風雲人物到階下囚



1936年，戴德森17歲了，那年夏天，他自河南雞公山美文學校畢業，返美進入了明尼蘇達州奧斯堡學院（Augsburg College）。這個在黃土地上長大的男孩，積極的融入校園生活，他參加各種社團，熱衷於寫作、參與校園刊物編輯，並擔任學生會會長。為了實現成為宣教士的夢想，大學畢業後，他申請進入燕京大學歷史研究所深造，為成就理想而努力，但這條道路最終卻因日本轟炸珍珠港而風雲變色。



1937年戴費德牧師夫婦與孩子們於返美休假期間的合影。8月，戴費德牧師夫婦與兩個女兒返回河南展開第三任宣教士任期，戴德森（後排右一）留在美國念書。（*Augsburgian* 1937, Augsburg University Archives 典藏）

## 校園風雲人物

1936年，戴費德牧師帶著全家返回美國休假，而甫自雞公山美文學校畢業的戴德森則進入了奧斯堡學院就讀。<sup>21</sup>他的大學生活可說是多采多姿，十分活躍。在他向美國自由信義會申請擔任宣教士的自傳中寫到「在奧斯堡學院的四年內，我努力充實知識，追求成為一名良好、富有同情心的基督徒教育者。這段時間我過得很快樂，也很充實，我忙於一場場的學生活動，與基督徒青年夥伴們一起激勵成長，和不同城市的教會交流，也藉由學校課程努力學習。這所有活動對於年輕人的成長過程而言，是非常有趣、無價的。」

這大學四年裡，戴德森參加了許多性質不同的社團，有藝術與文學氣息十足的合唱團、校園刊物 *Augsburg Echo* 《奧斯堡迴聲報》編輯、總編輯，*Augsburgian*（《奧斯堡人》，

21 今 Augsburg University，原為挪威信義會為教育美國挪威信義會移民，於1869年9月在威斯康辛州馬歇爾市成立的奧斯堡神學院，這也是該會在美國建立的第一所神學院。1872年遷移到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1874年開始大學課程，但仍以神學院為主體，大學為附屬。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大力發展大學部門；1963年神學院遷移至聖保羅市，成為今日的信義神學院（Luther Seminary），大學部獨立而出，2017年更名為奧斯堡大學（Augsburg University），至今仍以扎實的文科教育著稱。“ABOUT AUGSBURG UNIVERSITY”，<https://www.augsburg.edu/about/history/>（accessed October 20, 2022）；“AUGSBURG UNIVERSITY--Small to our students and big for the world”，<https://www.augsburg.edu/now/2017/05/30/augsburg-university/>（accessed October 20, 2022）

年鑑) 出版委員, 以及社團聚會時必須全程使用法文的 Le Cercle Francais 「法文圈」; 宗教性的「宣教社」, 藉由參與宣教社每周一次的會議, 獲得牧師、休假的宣教士們及學生帶來的宣教圈最新訊息。他也參與學生自治等公共領域社團, 如加入校園內非常活躍的「國際關係俱樂部」, 關注國家與國際事務, 參與政治專家對談的講座與論壇會議。此外, 戴德森也參與學生會, 並於 1939 年獲選為學生會會長。

除了社團活動, 戴德森還熱衷於寫作, 在學校的文藝性刊物 *The Dial* 發表文章, 及參加作文比賽。因為在中國成長的經歷, 也讓他受邀分享他所知的中國。雖然社團活動多姿多采, 但他也沒忘記身為學生的本分, 好好的念書。戴德森主修歷史、希臘文, 輔修哲學與英文, 平均成績落在 B<sup>+</sup> 到 A<sup>-</sup> 之間, 因而在就學期間獲得奧斯堡學院的獎學金。除了學校的課業, 他也到明尼蘇達大學選修政治學、哲學相關課程。



1937 年戴德森 (左) 與友人在奧斯堡學院合影。



1937 年 11 月 12 日, 新聞俱樂部重整, 戴德森 (左二) 擔任通訊秘書。圖為俱樂部成員的合影 (Augsburg Echo, May 25, 1939, Augsburg University Archives 典藏)



1937 級奧斯堡學院新鮮人合影，紅圈者即為戴德森。  
(*Augsburgian*, 1937, Augsburg University Archives 典藏)

由於宣教士的薪資並不豐厚，家庭經濟較為吃緊，因此課餘之際，戴德森也從事過不少兼差。他曾在罐頭工廠、社會福利之家、學校的木工店工作，也曾在位於明尼亞波里斯的瑞典醫院（Swedish Hospital）及怡景醫院（Fairview Hospital）擔任總機，並在美國自由信義會擔任數個月的刊物編輯，藉以賺錢補貼生活費。不過，熱愛服務的戴德森，仍不忘排出時間，奉獻心力在教會活動上，在主日學、幼稚園教書，也到教堂、學校及青年團契演講。

四年的校園生活，忙碌、豐富而充實，能與志趣相投的同學討論宣教活動、國家政策與國際事務，一起合作，共同促進學生自治、校務運作，也一起開心的唱歌。可說是將時間充分運用在課業、興趣與靈性生活上，盡情地享受校園生活與探索知識。



1939年5月19日，戴德森（右圖前排左二）獲選為奧斯堡學院學生會會長，最右者為 Lester Dahlen（鄧倫），是日後戴德森在臺開展醫療宣教工作的好夥伴。（右圖出處為 *Augsburg Echo*, May 25, 1939, 左圖出處為 *Augsburgian*, 1939, Augsburg University Archives 典藏）

## 未來的人生規劃

一個在那片黃色大地，古老中國土地上出生的美國孩子，跟隨父親戴費德牧師在一個舊秩序剛瓦解、新社會秩序還未穩固，風雨飄搖、動盪不安，隨時可能面臨生命危險的環境中成長。戴德森目睹父親面對困境時沉著冷靜、堅持傳揚上帝福音的理想。即使在他返美就讀大學時，在日本侵略中國、烽火四起的險惡條件下，父母仍義無反顧的重返中國宣教地服務。<sup>22</sup> 而他在河南就讀的雞公山美文學

22 1937年8月，戴費德牧師一行人返回河南後，夫人戴艾瑪與孩子們留在雞公山，而戴費德返回宣教駐地鹿邑恢復工作。那時的中國已陷入戰火中，戴德森曾說到，雖然美國領事並未拒絕發出讓戴費德牧師一行人返回中國的工作許可，但領事寧願他們離開，可見該地已經不安全，但戴費德仍舊勇往直前。  
“Missionary Ditmanson Continues Work In China”, *Augsburg Echo*, December 10, p.3.

校，那是一所主要給宣教士孩子就讀的學校，也是一個小型的宣教士國度，接著再到美國奧斯堡學院，一個由信義會創辦，初期以神學教育為主的學校。無論是雞公山美文學校，或者奧斯堡學院，都是充滿宗教氛圍與認同的教育環境。這一路走來，他感受到，也體驗到，也讓他尋覓到未來的人生道路。

他計畫好了，想要跟父親戴費德一樣，做一名獻身於中國的宣教士。1938年4月，《奧斯堡迴聲報》刊登了一篇當時戴德森於宣教徵文比賽中，以〈上帝的漁夫〉（God's Fisherman）<sup>23</sup>為名的獲獎文章。文中提到主耶穌以堅定的口吻告訴祂的追隨者——一群漁夫與工人，對他們說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此後，這些漁夫與工人朝著耶穌留給世人的大使命，不畏艱難險阻，一代接著一代前仆後繼地到世界各個角落去宣揚基督福音。文章中更提及宣教史上著名的宣教士施達德（C. T. Studd）<sup>24</sup>，一位拋棄財產，獻身亞、非大陸宣教50年，以及勇敢前往食人族之地的辛赫

23 全文收錄於本書〈下篇戴德森醫師的足跡：檔案選輯〉，編號01。

24 Charles Thomas Studd, (1860-1931)，中文名施達德，傑出的板球運動員，為英國聖公會派到中國宣教的宣教士，亦為Cambridge Seven（劍橋七人會）一員，其後更建立了Heart of Africa Mission（非洲之心教會，為今日的Worldwide Evangelisation for Christ (WEC) International）。他出身於富裕家庭，篤信基督教，相信上帝會為基督徒預備所需，因此將父親留下的遺產捐出一大部分。後來因為哥哥的過世，他決定到中國擔任宣教士，並於1885年抵達中國。他在中國渡過15年、印度6年，餘生則致力於非洲傳揚福音。



圖為 1920-1940 年中國鄉村風貌（左為 Aino Sofia Ahde 攝影，Finnish Heritage Agency 典藏；右為 Archives of ELCA 典藏）

布里底群島宣教的約翰·佩頓（John G. Paton）<sup>25</sup>。透過這篇文章的發表，可以知道當時才大二的戴德森已經有了很明確的目標，以身為上帝的漁夫自許，追隨這些擁有堅定信仰、不畏險阻、勇往直前的宣教前輩腳蹤，朝向海外宣教士之路邁進。

為此，他在大學時期把握機會增加語言能力，學習希臘文、參加法文社團，也努力找機會與中國人交談以了解中國情勢，並練習中文，維持中文能力；參加「宣教社」，多方了解海外宣教士所看到的世界；參與公共服務性質的社團，如國際關係社、學生會，了解世界局勢，學習推動與維持團

25 John Gibson Paton, (1824-1907)，蘇格蘭長老教會傳教士，在南太平洋辛赫布里底群島（萬那杜）傳教，除了傳入基督教，也為當地人引進教育與手工業。儘管生活中充滿疾病、危險與艱難，但在他的努力之下，辛赫布里底群島中的阿尼瓦島全數信奉基督教，並在群島中的 25 個島上都有了宣教士。由於其個性堅強，勇於承擔的勇氣，並且善於透過寫作來講述其宣教的故事，因此被視為宣教士的榜樣與靈感。“John Gibson Paton”，[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Gibson\\_Paton](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Gibson_Paton), (accessed October 20, 2021)



體運作的能力，這些都是為他未來的人生累積能量。

對於將來的人生規劃，戴德森在大學四年級曾經思考過攻讀醫科，但是醫學院昂貴的學費不是他個人與整個家庭可以負擔的，幾經思考後，他轉換方向，決定到中國攻讀歷史碩士學位。在他申請燕京大學<sup>26</sup> 研究所以及奧斯堡畢業生獎學金的信件中，他明白地提出計畫：在中國的燕京大學取得中國史碩士學位後，返美進入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再入奧斯堡神學院研習神學，取得任教資格後，再赴中國進入信義會位於河北瀋口的信義神學院<sup>27</sup> 任教，獻身於中國基督徒高等教育及培訓本地宣教人才。

26 燕京大學（1920-1952），於 1918 年由五個不同差會所成立的五所基督教大學合併而成，曾暫名為「北京大學」。1919 年司徒雷登接任校長一職，他接下並重新整頓這個充滿門戶之見、缺經費、沒校地的學校。首先 1920 年接受建議，將校名改為「燕京大學」。接著奔波籌募資金，在 15 年內返美 10 次向各大企業、財團募得大筆款項，購買校地、建立中國園林風格的大學校園；充足的經費與主張學術自由的校園風格，吸引許多在這紛爭的年代不欲受干擾，潛心於研究的著名學者加入。因其強大、堅強的師資陣容，提升了燕大的知名度和學術地位。1927 年燕大與哈佛、普林斯頓、牛津等著名大學合作。十年間，燕大從默默無名的基督教大學，躍身成為可與北大、清華鼎足的最高學府，該校畢業生亦能直接進入美國各大學研究所。〈司徒雷登〉，查檢網站：「典華」，查檢網址：<https://bdconline.net/zh-hant/stories/situ-leideng>，查檢日期 2022.11.25。

27 原名為「華中聯合信義神學院」，1913 年由美國鴻恩會、美國信義會、挪威差會、芬蘭差會聯合創辦，校舍位於湖北瀋口，1923 年更名為「信義神學院」，1948 年因大陸政局不穩，遷校至香港復課。1951 年因中國政府宣布新出入境法，禁止中港自由往返，改變了宣教士原先想要重返瀋口的計畫，扎根香港。1963 年學院移交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辦理，1977 年更名為「信義宗神學院」，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基督教香港崇真會聯合興辦、基督教台灣信義會及港澳信義會聯合主辦。〈學院簡史〉，查檢網站：「信義宗神學院」，查檢網址 [https://www.lts.edu/lts\\_history](https://www.lts.edu/lts_history)，查檢日期 2022.10.18。

對於到燕京大學讀書，戴德森也充滿了宣教熱忱與想法。他在一封 1940 年寫給時任美國信義會學生服務委員會執行主任希厄茨牧師（Rev. Fredrik Schiotz）的信件<sup>28</sup>中指出，信義會在中國的事工中忽略了大學生這個族群。大學生是中國未來的領袖，若教會忽視這股力量，他們有可能會被共產主義者、唯物主義者等利用。因此他到中國後，計畫藉由身處學生族群中的機會，組織類似於信義會學生協會的團體來引領學生，並爭取美國信義會學生服務委員會的協助來推動這個計畫。



1938 年日本軍隊坦克車駛過位在河北灤口信義神學院主樓前的道路，（ELCA Archives 典藏）

<sup>28</sup> 全文收錄於本書〈下篇戴德森醫師的足跡：檔案選輯〉，編號 06。



約 1940 年 2 月，日軍侵略腳步逼近，國軍在河南東部協助民眾撤離家園，車廂與車頂滿滿都是人，隸屬自由信義會的教會同工全都搭乘此列車離開河南，但之後戴費德及吳冠勛牧師又返回了宣教地，（ELCA Archives 典藏）

## 佔領區中的自由之土—燕京大學

正當戴德森返美進入奧斯堡學院一年後，1937 年發生了蘆溝橋事變，中國陷入日本侵華的烽火中，那時誰也不知戰爭何時會結束，但為何戴德森還是來到中國求學呢？1940 年，戴德森抵達中國時，美國尚未對日宣戰，而燕京大學為外國教會所設立的教會大學，因著其美國董事會的背景，使得當時已佔領北平的日本當局，為維持與美方的外交關係而未強制接管、干涉燕京大學的校務，因此燕京大學的學術自由得以維持，成為佔領區中小小的自由世界。<sup>29</sup>

29 查時傑著，〈私立基督教燕京大學歷史系所初探（1919-1952）〉，《臺大歷史學報》20 期，1996 年 11 月，頁 636。

在當時美國未參戰，也不欲參戰的態度下，美國人身處中國境內尚屬安全，而且在中國求學的費用遠低於美國，這也是出身宣教士家庭的戴德森所考量的重點之一。此外，燕京大學在司徒雷登<sup>30</sup>的領導下，成為當時中國頂尖，甚至是亞洲最出色的大學之一，該校畢業的大學生已可直接申請美國的研究所，這表示燕大的辦學水準已臻美國學術界的要求。綜合經濟條件及學術環境，為了實踐未來的人生規劃，戴德森依然選擇來到飄搖動盪的中國，追求理想。



戴德森於燕京大學未名湖前留影。

1940年7月31日，戴德森搭乘了巴西丸號（Brasi Maru）輪船，揮別舒適安逸的美國生活，自洛杉磯離美，途經夏威夷、日本、韓國，再穿過由日本扶植的滿州國，到達北平。因為長於中國，使初抵北平的戴德森如魚得水般的沉浸在豐富的中國文化。

30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一位出生於杭州的美國基督教南長老會傳教士之子。曾任南京金陵神學院教授、教務長，南京教務委員會主席、燕京大學校長以及掌實權的校務長）、美國駐華大使。燕京大學是他一生最為人稱道的功業，在他的墓碑上刻著的就是「燕京大學首任校長」，而最為人爭議的是 1946-1952 年擔任美國駐華大使一職。



1923-1940 年間的北京城城門。（Finnish Heritage Agency 典藏）

在 1941 年 1 月寄回美國的信裡，他大大的稱讚了燕京大學美麗的校園，他提到「我現在就讀的學校於中國被佔領的區域內，僅存幾所仍在運作的大學之一。與我們西方院校相比，規模不大，註冊人數約 1,100 人，但校園的面積大於明尼蘇達大學。燕京大學位在北京城外約五英里處，離太皇太后（慈禧太后）的頤和園只有幾里路。西山位在燕大附近，那裡有許多古老、風景如畫的廟宇。毫無疑問，這是我見過最美麗的校園，有蓮花池、小島，有十三層寶塔，有常春藤覆蓋的建築，都是以中國建築為藍本興建，還有許多宜人的步道。」<sup>31</sup>

的確，燕京大學的校園可說是全中國最美的校園。該校由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建築系的美國建築設計師亨利·

31 戴德森信件內容收錄於“Augsburg graduent i Kina”, *Folkebladet*, January 15, 1941, p.4.

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所設計。燕大創校校長司徒雷登對於燕京大學的設計要求在於依照中式建築的樣貌及佈局建造校舍，但主體結構須採鋼筋混凝土，搭配現代化的照明、取暖與管道設施。因為在司徒雷登的想法裡，校舍本身就代表著燕大的辦學目的，也就是保存中國最優秀的文化遺產。<sup>32</sup> 而這座校園也展現這項特色，就是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交集融合成的燕大精神。



貝公樓，原名施德樓（Bashford Hall），為燕大著名地標，大樓前所立的兩根華表，為圓明園遺物。

學術研究上，戴德森也於信中提到「我所修的課程主要是研究中國歷史和中文，我的目標是攻讀中國官方認證的文學碩士。這裡教學方法有許多方面與西方相似，但其中也存在差異性。燕京大學對學位的要求與美國大學有很大不同，學習研究的科學方法不像西方那樣受到密切關注。主要以中文授課，當然，裡面還大量穿插了孔子與孟子思想。燕大學術水準很高，整體教學品質非常好」<sup>33</sup> 在燕京大學與 1919 年創校時便擔任校長的司徒雷登有著積極與絕佳募款能力，再加上燕大的美國董事會背景、司徒提倡的自由風氣，在經費、美國背景、學術自由等三大要件下，燕

32 陳遠著，《燕京大學 1919-1952》（杭州市：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頁 31-33。

33 戴德森信件內容收錄於“Augsburg graduent i Kina”, *Folkebladet*, January 15, 1941, p.4.



1926年燕京大學全景。燕大校舍全採中國傳統建築形式，亭台樓閣、屋簷起翹，搭配中國古典林園意境，充滿了中國文化氛圍。（圖片來源：*Our University in Peking*, 1926）

京大學網羅了許多著名學者，在學術上不僅媲美清華與北大，該校大學畢業生更可直接申請美國大學研究所，由此可知燕大的辦學成績頗受肯定。其中，戴德森所就讀歷史研究所，大學部自燕大創校時即已設立，歷史所則於1924年創立，是燕大最早招收研究生的學系。系所內大師雲集，有梁啟超、顧頡剛、錢穆、陳垣、王桐齡、洪業、齊思和……等等，無一不是中國歷史研究大家。歷史系研究生第一年

需閱讀指定的書目清單、準備資格考，待考試通過後方得進入研究階段，由一或二人導師指導，進行專門研究，全體導師與研究生每日召開討論、提問會議，並準備畢業論文的寫作與答辯。<sup>34</sup>

戴德森對於在燕京大學的求學回憶，他在 1955 年前後申請欲擔任宣教士的自傳中寫道：「感謝奧斯堡學院校友會提供豐富的獎學金，讓我能夠於 1940 年到中國北京的燕京大學攻讀碩士。這一年中，我有機會在這個中國古老、漂亮的文化中心，對中國歷史、哲學與藝術做更進一步的探索。我與一位來自蘇州的年輕化學家住在一起，在中國餐廳吃飯，也花很多時間探訪在這古老首都的寺廟、宮殿與其他深具歷史的場域。我有機會去拜訪我們信義會的宣教地，並在這些宣教士到北京時去探望他們。在尋找論文資料時，我也到東北九省、山東與上海等地拜訪信義會中心」。生活上，除了獲得奧斯堡學院校友會獎學金的資助外，戴德森也於 1941 年起到北平美國學校任教，賺取薪資來補貼生活費用。

但這風雨飄搖中的平穩時光在不久之後，隨著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後而終止。其實早在 1940 年 10 月，美國國務院已通知身處中國日本占領

<sup>34</sup> 陳遠著，《燕京大學 1919-1952》，頁 105-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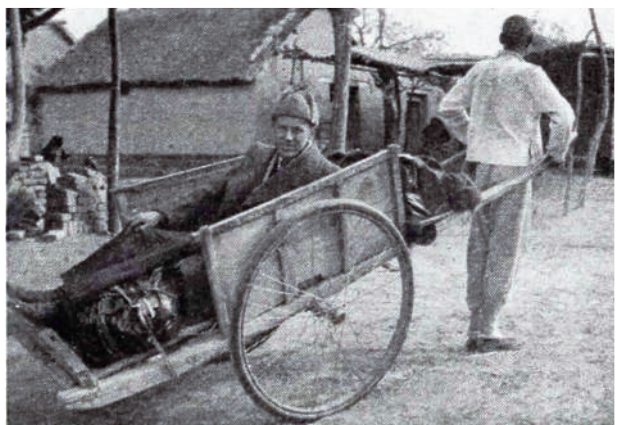
區的美國人要留心注意，因美日關係可能生變，需有撤離中國的準備。<sup>35</sup> 那時的戴德森也曾想要離開北平，前往未被佔領的自由中國，在他給妹妹瑞絲的信件中曾表達出他的想法。儘管北平當時的情況的確非常嚴峻，但沒人知道戰爭是否會往不好的方向發展，許多宣教士與外籍教職員都希望美國與日本之間不會發生戰爭。<sup>36</sup> 也許是樂觀的期待，讓戴德森繼續留在北平讀書，但終究事與願違。



戴德森於北平期間，記錄天壇  
圜丘壇（右）及紫禁城護城河  
（左）影像。

35 Frederick Ditmanson and Arthur S. Olson, *They Carry On*, Minneapolis, Minnesota: Lutheran Board of Mission, 1944, p.21。

36 “Marcy Ditmanson Studies At Yenching‘U’In China”, *Augsburg Echo*, February 5, 1941, p.1.



戴德森於河南信義會  
宣教駐地走訪留影。  
(*They Carry on: past  
and present*, 1944)

## 失去自由

我向所有居住在中國東部的美國公民再說一次，你們現在已經是日本的俘虜。自昨天夏威夷被日軍轟炸之後，美、日現在正處於戰爭狀態，不要離開你現在的住所，你會被告知下一步該怎麼做。打開你的收音機，就能得知進一步的指示。

1941年12月8日，上海英文廣播晨間新聞<sup>37</sup>

12月8日，由於美日正式宣戰，燕京大學來自美方的屏障也告失效，當日日軍即對燕大展開打擊與廢校的嚴厲手段，拘禁了校長司徒雷登及教職員，並佔領該校，而在

<sup>37</sup> Meredith and Christine Helsby, *He Goes Before There: Even into Prison, USA*: OMS International, Inc., 1993, P.33.

北平歐美僑民則是被軟禁在住處。歷經盤查後，在北平的日本「敵國」僑民獲得了有限度的自由，戴德森也是其中一員。當時日本憲兵規定，住北平的外籍人士獲准外出時，手臂上須配戴著約三英寸寬紅色臂章，美國人的臂章上寫著「美」，英國人則寫著「英」，上面還編有編號，<sup>38</sup> 行動上也被限制，僅能在城內活動，不能超出城牆範圍。<sup>39</sup> 因著當時尚能在北平城裡活動，因此戴德森仍舊可以在美國學校工作。

1942年6月，戴德森生病了，由於同住的中國家庭無法給予適當的照顧，因此他的網球球友，屬於遠東傳教會（Oriental Missionary Society, OMS）<sup>40</sup> 的宣教士 Meredith Helsby 便將戴德森接到住處的公寓樓上，就近照顧。<sup>41</sup>

往後的數個月裡，日軍將處在偏遠地區的外籍人士陸續遷移集中到大城市裡，原本被軟禁於河南歸德的戴費德

38 〈妙手行醫好心腸·半生濟世戴德森 苦難出頭獲讚揚·下月返美享天倫〉，《聯合報》，民 70.10.23；不過根據 Frederick Ditmanson and Arthur S. Olson, *They Carry On*, p.20. 及集中營其他人的回憶，臂章上的文字還有以「A」表示美國、「B」表示英國等，不同字母代表不同國家的標示方式。

39 Frederick Ditmanson and Arthur S. Olson, *They Carry On*, p.39.

40 現改稱為“OMS INTERNATIONAL INC”（國際宣教協會），為1901年由兩位電報員 Charles Cowman 和 Ernest Kilbourne 從芝加哥搬到日本，與日本傳教士中田壽司一起工作時，為與日本的每一個人分享耶穌基督的好消息，他們成立了遠東傳教會（Oriental Missionary Society）。目前該組織前進80個國家、約有300名全職傳教士，使用50多種語言持續傳道。“OUR ONE STORY”，<https://onemissionsociety.org/our-story>（accessed November 22, 2022）

41 Meredith and Christine Helsby, *He Goes Before There: Even into Prison*, p.41.

牧師於 1942 年 8 月 13 日獲准前往北平，與長子戴德森同居一處。<sup>42</sup>

美國對日宣戰後，由於當時美國為防範在美日僑充當日本政府的間諜，便將在美境內的 6 萬多名日僑集中到洛杉磯統一看管。為報復此一舉動，1942 年 10 月，日本軍事當局決定將其侵略佔領區的西方同盟僑民進行差別對待的措施。對涉嫌從事間諜活動者，特別是可能會對軍方造成危害者實施拘押，其他人則實施團體生活。日本軍事當局陸續制訂《關於在支敵國籍人等團體生活（草案）》、《集團生活所事務所官制草案》、《集團生活所事務處理准則》、《敵國人集團生活所實施日程》等，對敵國人集體生活做出具體規定。<sup>43</sup> 將佔領區內的僑民分別遷移拘禁於山東、上海、香港等數處。其中包含北平在內，整個華北地的西方僑民陸續分梯次的被遷移關押到設於山東濰縣樂道院的「濰縣敵國人集團生活所」，也就是後人所稱的「濰縣集中營」或「樂道院集中營」。<sup>44</sup>

42 Frederick Ditmanson and Arthur S. Olson, *They Carry On*, p.20.

43 熊月之著，〈上海盟國僑民集中營述論〉，《上海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引自 [https://wenku.baidu.com/view/694037e2551810a6f5248653?bfetype=new&\\_wktks\\_ =1670311722372](https://wenku.baidu.com/view/694037e2551810a6f5248653?bfetype=new&_wktks_ =1670311722372)。

44 此處原為北美長老教會所建的「樂道院」（Courtyard of the Happy Way），集教堂、醫院、學校、公園為一體，用以傳教、辦學和開辦診所之用，為在中國傳教的各教派中最大的宣教基地。